

从“在场的缺席者”到 “缺席的在场者”

——巴勒斯坦诗人达尔维什的自传叙事

邹兰芳

内容提要 本文以巴勒斯坦诗人达尔维什的自传《为了遗忘的记忆》和《为何把马儿独自抛下》为研究对象，指出自传作品是巴勒斯坦知识分子在宏大的民族历史叙事阙如的生存境遇中，以个人鲜活的记忆书写民族史、为民族身份再定义的有效途径；达尔维什自传“美学抵抗”的内涵在于以反讽的手法揭示“记忆”与“遗忘”在哲学层面上的悖论关系，以语言的力量来弥合权力话语在同为闪族子孙的巴以两个民族之间造成的感情创伤和历史叙事差异，从而为巴勒斯坦土地留下比政治抵抗更具人文意义的历史文化遗产。

关键词 在场的缺席者 缺席的在场者 自传叙事 美学抵抗

一、达尔维什及其自传叙事

在阿拉伯现代诗歌史上，巴勒斯坦最杰出的诗人马哈茂德·达尔维什（Mahamud Darwish, 1941 - 2008）享有独特的地位：其名字与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其作品成为巴勒斯坦浓缩的历史，其个人被看做巴勒斯坦民族的精神符号。诚如巴勒斯坦裔以色列作家安通·沙马斯（Anton Shammas, 1950 -）对他的评价：

达尔维什将其个人自传转化成一部现代史。奥斯陆协议后，达尔维什曾感叹“当巴勒斯坦人一觉醒来，竟发现他们的过去已消失”，但我们，作为

记忆被切除的幸存者，作为《为何把马儿独自抛下》的读者，则将永远铭记巴勒斯坦有两幅政治家无法抹杀的地图：一幅保存在巴勒斯坦难民的记忆里，另一幅展现在达尔维什的诗歌中。^①

达尔维什在经历了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给巴勒斯坦人民带来的失土丧邦之痛后^②，又经历了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的失败和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瓦解之挫^③，继而经历了1982年以色列入侵贝鲁特^④、由此被迫二度去国旅法的流亡之苦。1985年至1995年期间，诗人定居法国巴黎。流亡生涯不仅在达尔维什的“血液中洒下了沉思的盐，使他回到遥远的过去：对童年、故土、自然的痴恋”^⑤，还使他在痛定思痛中意识到，所有的记忆终究敌不过时间的销蚀，“历史是胜利者的清单”，作为失去家园的巴勒斯坦人，应以个人生命叙事的方式再现历史，以抵抗权力话语、抵抗遗忘，这是巴勒斯坦知识分子对自我身份和民族属性进行再定义、再建构的有力途径。于是在旅法期间和之后，诗人写了自传性散文诗《为了遗忘的记忆》（1987）、自传性长篇史诗《为何把马儿独自抛下》（1997）、自传性诗集《陌生女人的床》（1999）、《吉达利亚》（2000）等作品。

这些自传性作品标志着诗人的文学观由早期的“政治抵抗”转向“美学抵抗”。^⑥“抵抗文学”概念最早由巴勒斯坦著名作家格桑·卡纳法尼（Ghassān Kanafānī, 1936 - 1972）提出，用来定义20世纪下半叶巴勒斯坦作家声讨以色列入侵巴勒斯坦、号召人民奋起抵抗土地被占而创作的文学作品，其中，“抵抗诗歌因其易于传播的优点发挥了主导作用”^⑦。抵抗诗歌始终以爱国主义政治题材为主，旨在激发民众的革命热情，但也因题材的单一和意义的有限及注重内容超过形式美感而遭人诟病。达尔维什早期也创作了许多言辞铿锵、斗志昂扬的诗

① Mahmoud Darwish, *Why Did You Leave the Horse Alone*, Brooklyn, Aachipelago Books, 2006, Back cover.

② 第一次中东战争又称“巴勒斯坦战争”。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根据联合国“分治决议”建国。次日，阿拉伯国家向以色列宣战。战争历时约八个月。以色列多占了“阿拉伯国”约5700余平方公里土地，近百万巴勒斯坦人沦为难民，被驱逐出家园。

③ 第三次中东战争又称“六五战争”。1967年6月5日，以色列向埃及、约旦河叙利亚发动进攻，在六天内占领了西奈半岛、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总面积达6.7万平方公里。埃及等阿拉伯国家在战争中因各怀利益而惨败，蒙受巨大耻辱，加深了对以色列的复仇情绪。

④ 以色列侵黎战争，又称“加利利行动”。1982年6月6日，以色列向黎巴嫩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武装发动突然进攻，至8月12日停火，巴解武装伤亡和被俘达8000余人，所剩的1.2万余人被逼撤往八个阿拉伯国家或流亡世界各地。

⑤ بيروت، 2009، ص15. تحرير: عبد الإله بلقزيز، هكذا تكلم محمود درويش دراسات في ذكرى رحيله، مركز دراسات الوحدة العربية،

⑥ بيروت، 2009، ص130. تحرير: عبد الإله بلقزيز، هكذا تكلم محمود درويش دراسات في ذكرى رحيله، مركز دراسات الوحدة العربية،

⑦ عسان كنفاني، أدب المقاومة في فلسطين المحتلة، مؤسسة الأبحاث العربية، بيروت، 1982، ص11.

歌，被视为抵抗诗歌的经典之作，如成名作《身份证》（1964）；但随着诗人创作的日趋成熟和长期的流亡生涯，尤其是面对奥斯陆巴以和谈中巴解组织表现出来的政治软弱^①，进入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后，诗人创作重心由对题材的关注转移到对美学内涵的追求。不过，诗人也因此遭到众多学者尤其是抵抗诗人们的非议，谴责他放弃了创作“抵抗诗歌”，放弃了巴勒斯坦人民，陷入个人的伤感和情感的漩涡。^②而诗人的回答是“我放弃的是创作直接的、意义有限的政治诗，而并未放弃抵抗在美学上丰富的内涵。”^③

诗人的“美学抵抗”在《为了遗忘的记忆》和《为何把马儿独自抛下》两部自传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两部作品的出版先后相隔八年，前者采用了散文体，后者采用了诗歌体。对达尔维什自传叙事的研究，不仅能了解诗人个体生命的不断超越及其作品的自传叙事美学内涵，而且也展现出上世纪后半叶巴勒斯坦人从“在场的缺席者”转向“缺席的在场者”的艰难与曲折；并进一步反映了巴勒斯坦知识分子在宏大民族历史叙事阙如的生存境遇中，努力以个人鲜活的记忆书写民族史、对民族身份进行再定义。

二、《为了遗忘的记忆》——“在场的缺席者” 之自传叙事

“在场的缺席者”（the Present Absentee）是以色列官方在1950年颁布的《不在地主财产法》^④中对巴勒斯坦难民的称谓。根据这个法令，以色列将地主不在现场的土地大多用于建设以色列军事基地或犹太人定居点。自此，失去土地和民族身份的“在场的缺席者”——巴勒斯坦难民的存在始终是一个次要的存在。

① 1993年9月13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在华盛顿签署协议，之前以、巴双方谈判代表在挪威首都奥斯陆进行了一系列秘密谈判，并取得了重大进展，双方同意就巴勒斯坦在加沙和杰里科实行自治达成协议，故该协议称为《奥斯陆协议》；因在华盛顿签署，又称《华盛顿宣言》。该协议共有17项条款，涉及自治安排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达尔维什不满巴解组织领导人在协议中对以色列的让步，遂退出政坛，专心从事文学创作。

② تحرير: بعد الإله بلقرين، هكذا تكلم محمود درويش دراسات في نكرى رحيله، مركز دراسات الوحدة العربية، بيروت، 2009، ص161-162.

③ محمود درويش، حيرة العائد، من الأعمال الجديدة الكاملة 3، رياض الريس للكتب والنشر، بيروت، 2009، ص338. 后文出自同一文章的引文，将随文在括号内标出该文中名称《归者的困惑》的首字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另作注。

④ 在阿拉伯语中称为 Qanoon Elhader/Gayeb (قانون الحاضر الغائب)，该法令于1950年3月实行《不在地主财产法》把任何因1948年巴以战争离开家园的巴勒斯坦人归类为“不在者”（absentee），他们的土地由以色列保管人（custodian）管理。该法令还规定，保管人可以把土地出售给以色列发展局。同样的法律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也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实行，被剥夺土地的巴勒斯坦人没有得到任何补偿。在被占领土，这些根据《不在地主财产法》得来的土地大多被用于建设以色列军事基地或犹太人定居点。

在《为了遗忘的记忆》中，达尔维什愤怒而伤感地揭示了上世纪后半叶巴勒斯坦人作为“在场的缺席者”存在的吊诡——“我们的在场只是为了见证别人有权带着所有杀人武器宣布我们的最终缺席”^①；揭示了“在场的缺席者”与权力的抗争即是“记忆”与“遗忘”的抗争。

《为了遗忘的记忆》通过第一人称“我”追忆了被叙事者称为“广岛原爆日”——1982年8月6日贝鲁特大劫难的前后经过。作者兼叙事者劫后余生，流亡他乡，五年后当他独自啜饮思乡的苦酒、回忆起生死交错的命运时，仍充满了对战争和死亡的恐惧。战争为人们留下的的心灵创伤并未因战争的结束而被抚平，痛苦的记忆像梦魇一般纠缠着作者，挥之不去，又不堪回首。这种隐痛犹如“那些腿被锯掉多年后的人仍感觉到腿的剧痛，尽管腿已不在”（《为》：28），“被遗忘的浪花抛掷到贝鲁特岸边的人们”虽生犹死，虽死犹生。诗人“站在生命的站台上拖着自已的影子，流落他乡，去日不多……是忘记了回家的路还是忘记了记起……”（《为》：178）“记忆”与“遗忘”的抗争由此展开，而作者的记忆之都——海法港^②和贝鲁特是抗争的基点。

全篇以梦中的对话开始，又以梦中的对话结束，而对话双方是躺在灵柩里的活者与灵柩本身，这样一个开篇与结尾表明了《为了遗忘的记忆》是一场生死对话，浸润着已被掩埋的生命躯壳与尚未泯灭的灵魂之间抗争的悲凉。这种在精神分析学上称为“原初场景”^③的开篇模式奠定了全篇的叙事基调，之后的过程皆由此生发，仿佛全部叙事都由这一特定场景得以从记忆的深洞中拖出：

——一个梦境从另一个梦境走出：你还好吗？我是说，你还活着吗？

——你怎么知道我曾枕着你的双膝睡去？

——你在我腹部蠕动时将我唤醒，我意识到我是你的灵柩。你还活着吗？你听得见我说话吗？

——另一个梦境在释梦时就把我从当下的梦境中惊醒，这样的事常发生吗？

——是的，它就发生在你我之间。你还活着吗？

① 152. محمود درويش، ذاكرة للنسيان، رياض الريس للكتاب والنشر، بيروت، 1987، ص152. 将随文在括号内标出该著中文名称《为了遗忘的记忆》的首字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另作注。

② Haifa，地中海东岸港口城市，诗人的故乡，已被以色列占领。

③ “原初场景”就是导致精神性创伤的最初事件，它存在于人的潜意识中，并不断以幻想、梦的形式重复出现。达尔维什以此开篇，表明贝鲁特大劫难在他内心留下的创伤。他复原“原初场景”，是想将遗忘的记忆从记忆的深洞中拖出（参见赵山奎《精神分析与西方现代传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42-144页）。

——算是活着吧。(《为》: 7)

……

——只要我还能梦，就能活着。

——别死。

——我努力。(《为》: 188)

《为了遗忘的记忆》由开场的梦引出了另一个真实界——潜意识世界，提醒读者存在着另一时空。引入对潜意识世界的描述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换位修辞，是对疯狂轰炸下陷入极度混乱喧嚣的贝鲁特城这一“真实世界”的文学性比喻。^①贝鲁特劫难一直像“清醒的噩梦”(《为》: 178)纠缠着作者及其他劫后余生者，使作者回忆起当时的毁灭性情景时，尽管事过境迁，仍难以挣脱，文本中梦境人物——作者兼叙事者非但没有因此隐匿反而更加凸显。这样一个充满虚拟与梦境的开篇和结束使读者立刻意识到，要通过传统线性叙事技巧把握陷于毁灭和荒诞中的世界和历史是不可能的。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和传记实践的影响，20世纪传记文学家极度重视“梦”，在他们看来，“梦”和真实的事件具有同样的重要性“真实的和想象的事件在梦中会立即显现出相同的效果，而且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梦中，在产生更为重要的心理结构的过程中也是这样。”^②《为了遗忘的记忆》的梦境中的潜意识世界恰恰是阿拉伯真实世界的投影，是1948年后“在场的缺席者”——巴勒斯坦难民生存境遇的真实写照。

开篇后，回忆伴随着那天以色列空袭炸弹的呼啸声逐步展开，记述进程时断时续，夹杂进诗人四十岁之前的人生片段(人到四十这一点在全文中多次提到):诗人60年代的牢狱经历、童年记忆、十字军东征的故事、在巴勒斯坦度过的青少年时期以及那时的伙伴、反犹斗争、创办文学杂志等等;文本还不断将阿拉伯和欧洲历史上经典作品片段嵌进当下的描述中，如伊本·艾西尔^③、乌萨马·本·穆恩齐兹^④、塞万提斯等人的作品，当然也包括《古兰经》、《圣经》这样的经典。由此，《为了遗忘的记忆》呈现出碎片化的写作风格。

① 参见保罗·德曼《解构之图》，李自修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65页。在保罗看来，自传不仅仅是一种文类，而且是解读或理解人生的一种隐喻性修辞。

② 彼得·洛温伯格《精神分析学说与后现代主义》，罗凤礼译，载《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4期，第101页。

③ 伊本·艾西尔(Ibn al-Athir, 1160-1234)，中世纪阿拉伯著名历史学家，生于伊拉克，著有《历史大全》(al-Kamil fi al-Tarikh)、《莽丛群狮》(Usd al-Ghabah)等重要文献。

④ 穆恩齐兹(Usama ibn Munqidh, 1105-1188)，中世纪阿拉伯著名诗人和作家，生于叙利亚，著有《前车之鉴书》(Kitab al-i'tiba)、《营地和寓所》(Camps and Dwellings)等作品。

碎片化的叙事风格还表现在对时空的独特处理上。时空维度是自传的两大要素，个人记忆不仅是时间在空间中的滞留，也是空间在时间上的排序。《为了遗忘的记忆》整个文本所叙述的时间跨度仅为半天——凌晨3点至黄昏，但叙述时间却被无限拉长，诗人慢慢苦熬着“那历史上最漫长的一天”（文中不止一次提及），行文在当下和过去中不断闪回、切换；而空间便是已然成为人间地狱的贝鲁特城：一座座昔日的车站影影绰绰地耸立在烟尘中，头顶上炮弹呼啸，铅灰色的天空沉重得几乎要与大地合一，周围的断垣残壁、贝鲁特广场的有轨电线路线、沿途的建筑、街区、街坊、朋友家的公寓、咖啡馆以及评论杂志《迦密山》^①的办公室构成了回忆空间，诗人犹如梦游般沿着一条支离破碎的街道，漫无目的地踽踽独行。

虽然自传叙事可以制造一种连贯的模式来讲述人生故事，^②但达尔维什在《为了遗忘的记忆》中却只提供些断断续续的偶然事件，甚至一堆毛石和几块残砖碎瓦，因为，在被围困、轰炸的贝鲁特，任何藏身之所都可能变成葬身之墓，昔日熟悉的脸庞已化作鬼魂，脚下不再有大地，身侧不再有路标，能让记忆扎根的坚实土壤已流失殆尽，而意识中的记忆也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销蚀。还没有全然消失的是贝鲁特的一个影子，一个只能在回忆中栖居的地方，一座千里梦回却再也无法触及的城市，就像业已被以色列占领的作者的故乡海法。

诗人之所以采用碎片化的手法，似乎是希望读者能感受到，在历史的暴行与人类的残杀下，城市和人生的寻常记忆标志物已丧失了作用。面对权力和遗忘的威胁，现实中的巴勒斯坦人生活在无根系、无时空的噩梦中。《为了遗忘的记忆》的碎片式风格是诗人那没有参照时空的人生唯一可能的表达方式，藉此，作者把被历史否决的“在场的缺席者”的人生碎片拼接聚合。作家取“记忆”之形，成哀悼之实，通过回忆，土地和民族身份失落之痛得以战胜，忘却成为可能，一如米兰·昆德拉的名言“回忆是遗忘的一种形式”，“作者的回忆既是一种指向过去的行为，同时又是基于当下、朝向未来的建构”。^③那些飘零流亡的人们、那些生命印记随时都面临着被历史拭去的“在场的缺席者”，通过记忆留下某种不朽。

^① al-karmil (مجلة الكرمل)，该杂志是马哈茂德·达尔维什于1981年在黎巴嫩创办的季刊，其宗旨是为阿拉伯世界的思想、知识与文学的创新开辟园地，搭建作者与读者互动的平台。

^② 参见赵白生《传记文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66页。

^③ 参见余玉萍《以记忆抵抗权力——当代巴勒斯坦文学一瞥》，载《文艺报》2012年2月13日，第6版。

三、《为何把马儿独自抛下》——“缺席的在场者”之自传叙事

达尔维什通过书写《为了遗忘的记忆》来抵抗遗忘，以此表达悲伤和愤怒，表达对战争和死亡的恐惧，对已故亲朋好友的悼念。如果说这时期的诗人处于“在场的缺席者”之“生命抗争期”的话，那么，八年后的达尔维什在书写《为何把马儿独自抛下》时已进入凤凰涅槃的人生阶段。1987年，达尔维什当选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权力机构的执委会委员，之后又起草了《巴勒斯坦国独立宣言》。但1993年巴解组织同以色列达成奥斯陆协议后，达尔维什不满巴解组织领导人对以色列的让步，认为奥斯陆协议“带给巴勒斯坦人少得没有底线的公平，乃至巴勒斯坦人自己都不知道哪些领土已被占领，奥斯陆协议未出现任何一个包含撤退的表达”^①，由此遂向阿拉法特辞去了政务，专心从事文学创作。但退出政坛的达尔维什，并没有放弃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关注和政治抵抗，而是“以语言变革的方式，引起政治、经济危机的爆发和变革”^②。作为“缺席的在场者”，诗人在“灰烬过后将发生什么”^③的发问中崛起，通过个人生命书写来再现更久远、更宏大的民族历史，并以此表现自己的美学诉求，希望在“诗歌的土地上”建立巴勒斯坦国。诚如他在《缺席的在场》中的自问自答：

可诗人面对历史的铁犁又能做些什么呢？也只能靠记忆守卫那可见的和不可见的古道、老树和水井，保护语言，不让它隐喻的特点褪萎消瘦，不让它因死难者的呼号而过分消耗，他们要求在明日的记忆里占有一席之地，用比武器更强大的力量——语言的力量——去争夺那片土地。^④

自传性史诗《为何把马儿独自抛下》便是他所指的“比武器更强大的力量”。该史诗由包括开篇诗在内的七篇组诗构成，诗人采用了叙事、抒情、对话、象征以及诗篇间的互文等多种手法，通过回溯童年，叙述了上世纪后半叶巴勒斯坦人失土丧邦、颠沛流离的悲剧命运。诗歌围绕着逃亡、革命、探寻、失落、绝

① عادل الأسطه، أدب المقاومة من تفاؤل البدايات إلى خيبة النهايات، مؤسسة فلسطين للثقافة، دمشق، 2008، ص142.

② أدونيس، زمن الشعر، دار الساقي، بيروت، 2005، ص218.

③ محمود درويش، لماذا تركت الحصان وحيدا، من الأعمال الجديدة الكاملة 1، رياض الريس للكتب والنشر، بيروت، 2009، ص280.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在括号内标出该著中文名称《为何把马儿独自抛下》的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另作注。

④ محمود درويش، في حضرة الغياب، من الأعمال الجديدة الكاملة 2، رياض الريس للكتب والنشر، بيروت، 2009، ص488-489.

望、重生等主题展开追忆，并将巴勒斯坦土地上的神话、历史、文化、语言等元素融进自己的个人传记中，使个人传记成为一部有着丰富人文内涵的民族史诗。长诗中没有空泛的政治口号，只有真切诚挚的情感和瑰丽深邃的想象。诗人全部的创作目标都在于在“诗歌的土地上”建立巴勒斯坦国，当真正“现实的巴勒斯坦”并不存在时，那个叫“巴勒斯坦性”的观念仍完整地存在于诗人的文本中，换言之，诗人为“巴勒斯坦”这个民族共同体作了传，“马儿”即指向作者自己，也指向被历史抛弃了的巴勒斯坦人。

这部传记虽以诗歌这种不常见的文体出现，但它的传记性是不言而喻的。这一点从作品扉页上的献词和诗歌中的时空转换、事件陈述中不难看到。扉页上明确写有“纪念逝者：爷爷侯赛因 奶奶艾米娜 父亲萨利姆、献给生者：母亲侯莉娅”的献词。与《为了遗忘的记忆》的叙事时间跨度不同，在这本诗集中，诗人由“眺望”“自己的影子自远古而来”开篇，将记忆的时间跨度拉长，使回忆具有历史纵深感：

就像屋外的阳台，我随心所欲，放眼眺望

……

我眺望古时先知们的行列

正赤足登上耶路撒冷

不禁问道：在这新的时代

可有一位新的先知

……

我眺望自己的肖像正逃出自我

登上石头阶梯，拿着母亲的绢帕

在风中飘荡：

假如我像孩子般回到你身边

你回到我身边……什么将会发生

我眺望遮蔽了叶哈雅^①的橄榄枝

我眺望在阿拉伯语词典中已消亡的词语

我眺望波斯人、古罗马人、苏美尔人，

^① 伊斯兰教的先知，宰凯里雅之子，也称“耶哈亚”、“叶海亚”。在《新约》中称为施洗约翰。穆斯林们认为叶哈雅是真主话语的见证人与正义的先知，并预示了尔撒（耶稣）的到来。

眺望新的难民……

……

我看见自己的影子

正自

远古

而来…… (《为何》: 277 - 281)

从期盼“两日后重返家园”(《为何》: 300)的侥幸到被残酷现实击败的痛楚,从“期待凤凰般的涅槃”(《为何》: 357)到“被他人咳嗽中唾弃”(《为何》: 434),在这本自传性史诗中,诗人不仅书写了自己的一生,而且记录了“缺席者”们被历史遗弃的命运。诗人回忆起自己的童年、被占领的场面、母亲风中的绢帕、家乡的石头台阶、先知的故事和神话……往事像电影画面般呈现、切换:诗人出生在地中海东岸城市海法,那时正是杏花满树的三月(《为何》: 286);1948年当诗人七岁时,以色列军队入侵海法,将他父亲和其他难民逐出家园,巴勒斯坦人开始大逃亡(《为何》: 290);逃亡的路充满了艰辛困顿,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全家人在黎巴嫩安顿下来(《为何》: 316);母亲是他的守护神,教会他语言,面对国内严峻的现实,劝他远走他乡,但无论身处何方,只做自己(《为何》: 343);60年代诗人因思想激进被以色列当局三次关押入狱,诗人自比十世纪阿拉伯哈姆丹王朝的“王子诗人”艾布·法拉斯,“王子诗人”出征拜占庭被俘后在狱中写下了著名的《罗马集》,达尔维什借此抒发自己内心的苦闷(《为何》: 369);在诗人感到绝望之时,语言拯救了诗人的心灵,诗人将语言视作祖国,笃信诗歌、写作具有的神奇力量,他将用语言战胜一切,建立一个语言的“圣地”(《为何》: 365);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国家遭受惨败,诗人借德国反纳粹主义戏剧家、诗人布莱希特在军事法庭上的证词,质问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和西方大国利益集团在中东的阴谋和罪行(《为何》: 418),等等。

不止于此,诗人仿佛一只飞翔在高空的鸟儿,以全景式的俯瞰目光,审视人类历史的更迭,审视人类当下的存在,将自传融入民族的群传中。诗人不仅是个人回忆的亲历者,也是巴-犹两族人民集体记忆的见证者,还是巴勒斯坦这块土地的神话、宗教、传说、语言的代言人,诚如诗人所说:

我化为向两面打开的窗子归来……

忘记作为个体的自我
以便在一个民族中汇成群体
耳闻窗外异乡水手们的赞歌
目睹交战者的家书。(《为何》: 377)

作品中，诗人援引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大宗教的多个典故，借用约书亚、叶哈雅、优素福等先知人物建构自己的叙事体系。比如，诗人援引《圣经·旧约》中该隐因嫉恨杀害弟弟亚伯的故事，谴责现代犹太人对同是闪族后裔的阿拉伯人手足相残的不义；用《圣经·旧约》中平民拿伯的葡萄园被以色列国王亚哈与王后耶洗别强占的典故，倾诉现代阿拉伯人反被以色列人送上法庭审判的冤情。诗歌中阿拉伯人的祖先伊斯玛仪反复吟唱“哈利路亚/哈利利亚，/一切终将重新开始”（《为何》: 311），并甘愿用生命去换取土地“竖琴啊，请将失去的带回，并亲手把我宰杀”（《为何》: 315）。诗人希望从更久远、更宏大的历史中寻找在巴勒斯坦这块土地上生活的民族的共同属性，希望用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自古以来共有的集体记忆——神话、宗教、传说、语言甚至诗韵——来弥合权力话语在同为闪族子孙的两个民族之间造成的感情创伤和历史叙事差异，从而在文化层面上为巴以和平开辟新的途径。

四、达尔维什自传“美学抵抗”的内涵

由于思乡心切和对奥斯陆协议的不满，1995年达尔维什回到拉姆安拉，然而这次回来，他并没有归乡感，而是感叹“他的巴勒斯坦仍然遥不可及”^①。他生活其中的巴勒斯坦和他诗歌中的巴勒斯坦之间的沟壑能填平吗？他的无根之感和流亡创伤能否因归乡而得到慰藉？答案是否定的，诗人其实经受着双重流亡：国外的流亡和国内的流亡。在经过多年的文化围剿和长期的流亡生涯以后，诗人最终意识到，只有与世界诗性交融，去除民众赋予自己的既定光环，不去回应政治的鼓噪和民众盲目的民族主义狂热，才能赋予巴勒斯坦更广阔的含义，它不仅是一块土地、一个国度，它还象征着存在，象征着人类的正义。由此，诗人将自己的个人回忆融入巴勒斯坦人民共有的流亡记忆中，用巴勒斯坦地域上世代繁衍的种族、历史、神话、宗教、语言的多重性构建文化属性，在“诗歌的土地上”建立理想中

① بيروت، 2009، ص15. تحرير: عبد الإله بلقزيز، هكذا تكلم محمود درويش دراسات في ذكرى رحيله، مركز دراسات الوحدة العربية.

的巴勒斯坦国。这就是达尔维什的“去政治的政治”抵抗，即“美学抵抗”。

达尔维什自传的“美学抵抗”的内涵首先表现在以反讽的手法揭示了“记忆”与“遗忘”在哲学层面上的悖论关系。在达尔维什看来，人类历史总是处在不断“记忆”与“遗忘”的双向运动中，一方面人类努力在时空中刻下自己的名字以示不朽，另一方面他们的名字又终敌不过时间的销蚀和历史的更迭而被遗忘；然而越是以权力暴力的方式想抹去的记忆，越会以不断被提醒的方式得到加深，这正是“在场的缺席者”的现状：

那些被遗忘的浪花抛掷到贝鲁特岸边的人们能逃脱自然的法则吗？谁还能为他们重组记忆——那除了遥远生活的破碎的影子便了无内容的记忆？这样他们就足以被遗忘了吗？在不断提醒他们疏离于土地和社会之外的暴虐语境中，谁能帮助他们遗忘？谁愿意接受他们为“公民”？谁能保护他们免遭歧视和围剿的鞭笞：你们不是这儿的人！

那些遭内部社会驱逐的人们，那些被剥夺了工作、平等权利的人们，那些被遗忘的人们，同时也为这种暴虐鼓掌欢呼吧，因为它赋予他们记忆的恩泽，促使他们记住权利被剥夺的现实，以训练自己忘不了祖国。他患上肺病以便不忘记肺的存在，他夜宿野外以便不忘记另一个天空，他好好服务以便不忘记爱国使命，他因被剥夺“本土化”^①而不忘记建立自己的巴勒斯坦国，总之，他应该成为阿拉伯兄弟的“他者”，以便被提醒要去赢得解放。

达尔维什“美学抵抗”的内涵还表现在通过语言变革来颠覆僵化封闭的话语系统，让“缺席的在场者”用语言建构新的文化历史空间，以抵抗巴勒斯坦人在政治上的被歧视和被宰制。诗人曾感叹道“成为诗人的巴勒斯坦人和身为巴勒斯坦人的诗人具有怎样不同的含义？前者是历史的产物，因语言而存在，而后者是历史的牺牲品，因语言而胜利。”（《归》：488）他指出“我们应当将文化中的历史运用起来，这需要不断拓宽各方面的知识领域：需要保护我们的群体记忆，捍卫我们记述历史的权利，捍卫我们的历史意识形态，发展我们表达自身民族属性和人文属性的各种工具，建构社会民主文化、自由文化和尊严文化，加强人权意识。”（《归》：219）达尔维什的“美学抵抗”旨在为巴勒斯坦土地留下

① 这里的“本土化”是指阿拉伯国家当地政府吸纳巴勒斯坦难民为本国正式公民的政策。

比政治争斗更具人文意义的语言文化遗产，从而在坚持民族属性的同时，追求“建立在广阔的人文天际上”^①的世界主义。

达尔维什的自传性作品便是他“美学抵抗”的文本实践。在作品中，诗人着意于对语意的探索和创新。比如，在《为了遗忘的记忆》中不断出现“我们出走吧”、“去海那边”的呼唤，“出走”的语意表达唤起了读者对《旧约》中“出埃及记”的联想，今日既无“身份证”又无“户籍卡”的巴勒斯坦这一流亡族裔恰似当年被法老士兵追逐、渡过红海、穿越西奈半岛的摩西，历史悲剧性地循环上演；而“海之边”正是诗人家乡海法的方向，“海”在阿拉伯语中被称之为“巴哈尔”，该词也有“诗歌格律”之意，显然，诗人的归乡路便是对诗歌韵律的承继、坚守和弘扬。在绵延的时空中，当代巴勒斯坦人是屈从于被歧视和被宰制的历史命运，还是奋力从暴虐、僵化的权力话语中突围，创造意义？答案显然是后者。在诗人看来，对词语遗产的挖掘是对巴勒斯坦民族记忆的唤醒和凝聚，是民族共同体在没有土地的大地上唯一的承载，如他所吟诵的那样：

大地上再无土地承载我
只有我的话语携我飞翔
它像从我肌体分身的鸟儿
建起它的旅巢
在我的残骸上，在周遭幻世的废墟上（《为何》：382）

“旅巢”既是迁徙又是定居，诗人在不断的流亡中，凭借着民族的语言与文化寻找归乡的路，这也是诗人一生的写照。

[作者简介] 邹兰芳，女，1966年生，博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教授，从事阿拉伯现代文学、传记文学的研究。近期发表的论文有《对西亚北非的文化审视》（载《读书》2012年第3期）、《论女性自传中女性主体的漂移性》（载《当代外国文学》2010年第4期）等。

责任编辑：严蓓雯

① محمد ابراهيم الحاج صالح، محمود درويش بين العزّة والصبار، وزارة الثقافة سورية، دمشق 1999، ص.5.